

孫春在撰

清末的公羊思想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春在撰

清末的公羊思想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初版

清末的公羊思想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六角正

撰者 孫 春 在

發行人 朱 建 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王一國 陳 巧

清末中國在內外交迫下感受到強烈的變革壓力，在持傳統思想體系回應內外挑戰的知識分子之中，公羊思想家們是積極進取且極富創意的。對清末公羊思想的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近代中國由傳統趨向現代的轉折過程。

全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說明研究的目的與方法；第二章把西漢至清代中葉公羊學的發展作一背景式的描述；第三、四、五章是探討清末公羊思想發展及流變的主體；第六章結論，由歷史與思想這兩個角度為本書主題作嘗試性的定位。

孫春在

貴州人，民國四十六年生。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學士、歷史碩士。

曾任明德基金會生活素質研究中心研究員，現在軍中服役。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一
第一節 研究清末公羊思想的原因	一
第二節 研究的方法	六
第二章 兩漢至清中葉的公羊思想	一二
第一節 西漢公羊學的重點及其與政治的關係	一二
第二節 東漢何休的註解及釋例	二〇
第三節 唐代中葉的公羊家	二三
第四節 清中葉常州學派的公羊學	二五
第五節 兩漢至清中葉公羊學性質及其對清末的影響	五七
第三章 準備期（一八八四—一八九四）	七五
第一節 本期上下限的採擇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七五
第二節 續釋公羊（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七七
第三節 以制度判分今古學派（一八八六—一八八七）	八一
第四節 批判古學（一八八八—一八九四）	九七
第五節 本期公羊思想的特徵	一一一

第四章 興盛期（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二七

第一節 本期上下限的採擇與時代背景的關係……………一二七

第二節 本期的主導思想家——康有爲……………一三〇

第三節 各公羊思想家的「三世」模式……………一四五

第四節 「內外」思想在內政外交上的應用……………一六一

第五節 本期公羊思想的特徵……………一六七

第五章 完備及蛻變期（一八九九——一九〇二）……………一八一

第一節 本期上下限的採擇與時代背景的關係……………一八一

第二節 「三世」內容的完備……………一八三

第三節 「二世」思想的浮現——理想與現實的斷層……………一九八

第四節 由「小大」到「天人」……………二一六

第五節 本期公羊思想的特徵……………二二二

第六章 結論——清末公羊思想的歷史及思想定位……………二四六

第一節 清末公羊思想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承續及影響……………二四六

第二節 從一般系統的觀點看清末公羊思想在傳統體系中的角色……………二五六

第三節 以現代模式回視公羊思想在清末對於新素材的回應……………二六六

參考書目……………二八二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清末公羊思想的原因

所謂「清末的公羊思想」，指的是清朝末年以春秋公羊學各義例爲核心所形成的思想體系。本文所討論的「清末」，其時間斷限爲自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二年。

歷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標定時間的上下限並作分期探討，本是不得已而又不得不然之舉。不過，對清末公羊思想的研究，却正因標定其時間的上下限並加以分期，而顯示出了更多的意義。至於各斷限的考量因素，將在各章之首節中加以討論。

同時，使用「清末」一詞，也可使本文所探究的主體和清中葉常州學派的公羊學有一明確的分野，從而使二者的異同及傳承能交代得更加清楚。

至於使用「公羊思想」，而不用「公羊學」一詞，則是因爲清末諸「公羊家」實際上只是以「公羊學」中的各義例及模式作爲他們思想體系的核心。他們的興趣不是「公羊學」本身的學術問題，而是如何形成一種適合當時的思想，並據以回應內部及外部的挑戰。因此，本文使用這一較爲寬泛的名詞——「公羊

思想」，意指本文企圖對清末以公羊學義例為核心所形成的思想，作一全面性的探討。

挑選「清末的公羊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

(一)清末中國變遷的加速及一度斷絕

人類歷史的近代特徵之一，就是變遷的加速度（註一）的顯化。在物理的概念上，「加速度」與「力」的關係，很可用「一體之兩面」來形容。對於一個社會的變遷過程而言，隨著加速的明顯化，內外壓力對這一社會所形成的挑戰，也跟著增加，這應是一個可以得到共識的事實。進一步，作為加速或力的作用體的社會，有時因傳統慣性來不及回應急劇的挑戰，而發生了「斷絕」（註二）的現象。

本文並無意以一個物理學上的簡單公式來概括整個的中國近代史，並且「解」加速」（acceleration）與「斷絕」（discontinuity）這兩個名詞是A. Toffler和P. Drucker觀察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社會所得到的結論，不論在時空上都與清末的中國有很大的差距。同時，「加速」在西方社會中主要是以內部變遷的形式表露，而在清末的中國，却泰半由外力催迫而成。

但是，這兩個概念確實有助於我們去思考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八四二）以降的中國近代歷史。「世變日亟」（註三）和「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註四）是十九世紀末知識分子親見的現象，而發生在政治及文化上的數次「革命」也指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是處在一種近似「斷絕」的狀態。新的政制、經濟形態與思想方式以加速輸入中國，迫使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以加速回應。每一度的「斷絕」，多少意味著回應的又一次失敗。

在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伴隨著新政制的建立，知識分子回應西方的思考模式泰半趨向於中

西雜糅，企圖兼採衆長。因此，辛亥年之後的現代思想史，呈現著極為複雜的表象，各種思想脈絡交錯其中，甚難理出一個統系來。

相對於此，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年）前後盛極一時的公羊思想，則可視為傳統知識分子以傳統模式對西方所做的最後也是最勇猛的一次回應。對這一度「傳統式」的回應增加一分了解，有助於研究現代各種中西雜糅及新創的思想體系。

（二）清末公羊思想所呈現的異點

戊戌維新之前，持公羊思想倡論變法的知識分子，在政治及學術上激起了一陣狂烈的浪潮。值得注意的，不僅是這些公羊思想家特立於時代之中的勇氣，而更是公羊思想體系中賦予他們的自信。

由戊戌前後公羊思想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異點，使清末的公羊思想顯出和當時其他的傳統思維極大的歧異。首先，是他們迎向西學西政的態度，是十分開放的、樂觀的、正面的、勇猛的、富創意的、有建設性的。他們秉持的是相當傳統的經學體系，但却毫無當時絕大多數傳統士人對西政西學的排斥、悲觀及退守性質。

同時，清末的公羊思想也不能用當時開明官僚的「中體西用論」加以範圍（註五）康有為在對光緒帝的上書之中，勸光緒帝以日本明治天皇的法制為「政法」，而以俄國彼得大帝的求進之念為「心法」（註六）。「心法」一詞，在傳統儒學中是有非常本源的地位的，若非是公羊思想家由他們的模式中導引出了更高層的理念，則這種在當時甚為奇詭的說法應不會出現在對皇帝的上書之中。

另一方面，由反對者的識評：「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註七）語中，也可體味到清末

公羊思想在回應西方上所表現出來的勇猛精進。

復次，清末公羊思想所呈現的不僅是義例或綱領，最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些模式。這也是與其他的傳統思維不同之處。有了模式化的體系，使研究者在分析及掌握重點上得到很多便利，由此也更能評估公羊思想在演變過程中的效用及弱點。對於較為形上的中國傳統思想而言，清末公羊思想的模式化風格是彌足珍貴的。

(三) 公羊思想家蛻變後的保守性格

在戊戌維新之前，說公羊思想家們是當時中國思想最新、最激進的一群知識分子，當不為過。政變之後流亡國外的他們，依然是最新思潮的引介者。但是，在二十世紀之初，或更精確一點說，在本文標為清末公羊思想下限的一九〇二年之後，以康有為為首的公羊學者們改呈現一種保守的性格，表現在他們政治及學術事業上。這一轉變，也應自公羊思想模式中去追溯。

另一方面，也有些早歲濡染於公羊思想，而最後導引出革命論的思想家。這兩個極端的表現，促成對清末公羊思想之特徵及流變加以研究的興趣。

(四) 清末公羊思想的直接及間接影響

雖然在百日維新之後，公羊學者們永久地喪失了政治主流的地位，但是他們的思想直接間接地給予清末民初的思想界以廣泛的影響。例如各種的歷史階段進化論，都明顯地衍自公羊思想，或至少可以加以比較。對公羊模式的釐清，有助於對這些同類論證的評量。

此外，由公羊思想中發展並蛻變而成的「大同思想」，成為二十世紀後中國的世界理念，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要掌握「大同思想」，也不能不上溯到清末公羊思想的研究。

尤有甚之的，在民初新文化運動之後首度出現的思想大論戰——一九二三年開始的「科學與玄學之爭」，參與的要角多與梁啟超有密切的關係，而該次大論戰也肇因於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註八）。梁啟超在一九〇二年之後，已由公羊模式的思考中脫離而出，進而對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作重新的學習及思慮，科玄之爭可說是梁啟超晚年的一次重要的態度表示。在這次論戰裡，傳統與現代過渡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與「形上學」加以詮釋，並把「形上學」與「精神文明」相連，從而肯定傳統儒學的價值。另一方面，「科學」的揄揚者更指清代的考證經學具有「科學精神」（註九）。欲澄清此一中國思想史上極具關鍵性的大論戰的各個脈絡，也以自清末公羊思想的研究作出發點為宜。

(四) 前人研究的不足

關於戊戌維新變化的研究為數甚夥，對清末各公羊學者個人的研究亦不在少數。由這些著作之中，自然也能對清末的公羊思想有一概括的了解，但是這種巨觀的認識，並不足以回答上述各問題。

前人的研究多不以「公羊思想」本身為研究對象（註一〇），而是將它附麗在「變法思想」（註一一）或「進化思想」（註一二）的名目之下。所著重的要點不同，所得到的收穫自不一樣。本文的著眼處是一個完整的傳統體系如何在清末的加速變遷中肆應及蛻變，因此無法僅由各支離的公羊研究片段中得到答案。

至於少數探索清末公羊思想家個人公羊思想的論文（註一三），一方面不能顯示整個的思潮，另一方面由於未做分期研究，常把一個思想家前後二三十年的思想混而談之，並且未詳審作品年代的訛誤，使得

許多細微而具關鍵性的轉折因素，流失在這種概觀式的態度之中。其結果是，縱或把清末公羊思想的幾個表徵列舉了出來，却不能解釋它的演變狀況及原因。如此一來就失去了它在歷史與思想雙方面的定位因素，使得研究的結論只能發揮零星的啓發之用，並不足以構成近代思想史的一個環節。

最後，大多數的清末思想研究，都側重於外部的挑戰，而忽略了內部的演變。例如談到清末的公羊，只強調「三世」史觀受西方進化論的影響，而忽略了何以在清末春秋公羊學能造成龐大聲勢的背景。講「夷夏」的《春秋》學在有滿漢問題的清代並不是一個沒有顧忌的研究對象，清末公羊學的興起必須溯自清代中葉，因為那時復盛的常州學派解決了許多公羊學內部的難題，並揭示出許多新的發展方向，才使清末的公羊思想在內外困局之中展現了一枝獨秀的丰采。換句話說，「內在理路」（註一四）對中國近代思想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常被忽略的。

凡此種種，都是促成本文以「清末的公羊思想」爲主旨而加以研究的誘因。

第二節 研究的方法

（一）研究用的史料

本文側重內在理路的演變，因此在史料的選擇上以各思想家的著作爲主，輔以他們的傳記，以及時代背景的研究。至於各種二手的研究成品，自然也虛心接納各前輩的創見。

由於很重視公羊學本身的發展，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東漢何休的《公羊傳何氏解詁》以及散

見於《學海堂經解》、《南菁書院經解》及個人全集中的各清中葉公羊學者的作品，概在本文討論之列。清末的公羊思想家如廖平、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的作品，都已彙集爲叢書。康梁的作品由於研究者衆，大致已有完善的年代考證，便利研究甚多。其餘有關公羊思想的論議，多見於清末維新派的刊物之中，如「時務報」、「湘報」、「清議報」等。《皇朝經世文新編》內也收有不少有關的作品，同時反對者的攻訐之詞《翼教叢編》裡，也有可探的篇章。《戊戌變法文獻彙編》則提供了一八九八年前的變法思想資料。

至於前人對清末公羊或今文經學思想的研究，如前節所述，散見於各相關論文之中，此處不一一備載，而將於各章節中討論。本文對前人研究的擷取以年代考證的結論爲主，其中尤以康有爲《禮運注》及《大同書》的成書年代最爲重要。

本文的結論部分，企圖將清末公羊思想加以歷史及思想上的定位。探討思想定位所用的模式，旁採於各相關學科，嘗試中的粗疏之處，在所難免。

(一) 分期研究

經過對各清末公羊思想著作的探討，將清末公羊思想分爲三期來研究，分別是「準備期」（一八八四——一八九四）、「興盛期」（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以及「完備及蛻變期」（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分期研究並著重思想的轉變與異同，是李永熾老師所再三提示的研究要點，實爲近代思想研究的重要法門。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前後僅十九年的時間，但其中思想已有多次的轉折乃至於蛻變，若不作分期的細部探索，是不可能釐清其中脈絡的。

分期的標準、上下限的取擇以及形容該期特色的名詞選用，都在各章之初敘述。

(三)各期主題的因宜處理

由於各時期公羊思想的主題不盡相同，思想與史事間的互動方式也不一樣，因此在大的分期之下，採用不同的探討方式。或作更細的思想流變分析、或比較一主要模式的各種變化、或指出蛻變發生的原因。要言之，根據該期的思想主體而選擇合適的敘述方式，枝葉部分則不得不加刪略。

(四)定位式的結論處理

清末公羊思想各期的特徵在各章的末節已加敘述，在結論章中則對整體作一歷史與思想雙方面的定位嘗試。在歷史的角度上說明清末公羊思想的承傳及影響，在思想層面則作模式分析。

(五)研究上的限制

本研究所遭遇的最大限制自是研究者個人的淺薄學識。由於對清末傳統思想除經學外的兩大脈絡——理學與佛學——只有極膚淺的認識，因此本文只能自限於經學的部分。如此一來，對於深受理學培養及佛學薰染的各清末公羊思想家，難免有以偏概全的現象，唯此一缺失是短期間內無法彌補的。

其次，清末公羊學的要角之一——廖平，由於前此未受到如康有為、梁啟超等所受的重視，因此其卷帙浩繁的《六譯館經學叢書》中的各著作多半未經時代先後的排比，對其人的生平也少有研究。本文視廖平為清末公羊思想萌芽的契機人物，對於其著作自應加以全面而有系統的探討，但限於個人的才力及訓練，也必多疏失之處。

最後，據以評量清末公羊思想在思想上居於何種位置的標準，也是一甚不成熟的產物。本文企圖藉模

式化的分析以多了解一些傳統思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但實在只是一個初探而已。

註釋

註一：艾文·托弗勒對「加速度」在社會變遷中的意義有極精到的詮釋。見A. Toffler, *Future Shock*,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0.

「加速度」概念應用在社會經濟史上，係用以指明社會經濟的變遷呈現一種速度遞增的現象。易言之，量量化的社會及經濟指標，在時間函數上表現出「遞增的遞增」性質。在近代史的研究裡，往往視「現代化」的過程為「進步」的同義語，在這一層意義上，「加速度」可以用「加速進步指標」來理解。也就是說，這一指標是正面的。這一概念有助於了解一個社會內部及外部挑戰的變遷情形。

註二：彼得·杜拉卡是「斷絕」概念的創始者。見P.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New York, 1968.

由傳統歷史的角度看，「現代」是「傳統」的重演或衍申。姑不論歷史循環論，即使是持直線進化思想的近代學者，往往仍秉承抽取傳統精髓並在當代引伸發用的概念，來面對自身所屬的社會。但是，隨著變遷的加速，一個「世代」的壽命由以往的數千、數百、數十年，漸次發展到以數年為單位。兩個世代之間的聯繫，隨著其間世代的增多（且是加速地增加）而淡薄。在近代史上，若以五十年的間隔來比較一個社會的今昔，就會發現到極大的差異，所謂的「斷絕」或「不連續」雖則稍嫌誇張，但却有助了解這個新現象。透過掌握現代化的步調及由傳統斷絕的危機，更可體會近代史上各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內在及外在趨迫力。由世界的視野上都可觀察到「現代化」所帶來的斷絕壓力，更遑論以加速面對現代西方的傳統中國？

註三：「論世變之亟」是嚴復在一八九五年的作品。見《戊戌變法文獻彙編》（臺北、鼎文一九七三），第三冊，七一頁。

註四：康有爲「上清帝第四書」（一八九五），《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二冊，一七五頁。

註五：參見王爾敏「清季知識分子的中體西用論」，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一九八〇），第五一、七二頁。以及「晚清政治思想及其演化的原質」，同書，第十七頁。

本文同樣以爲清末公羊思想中固有「中體西用」或「西學中源」的性質。但基本上公羊思想家有以世界爲整體對象而建構其「一般系統」的趨向，這一特質是不宜以「中體西用」輕易概括的。

註六：康有爲「上清帝第六書」，《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二冊，一九八頁。

註七：葉德輝「與石醉六書」，《翼教叢論》（蘇輿編、臺北、臺聯國風，一九七〇），六：十四。

註八：見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科學與人生觀——科學與玄學論戰集》（臺北、問學，一九七七），第三頁。

註九：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同右，第廿七頁。

註一〇：其中唯一明顯的例外是陸寶千的「清代公羊學之演變」，爲氏著《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一九七八）的第六章。該文對清代各公羊學者的生平、傳承及著作有非常簡扼而清晰的介紹。但是其對象爲整個清代公羊學的演變，並非著重於清末中西相會的時代。同時該文是比較整體地來看公羊學術中的幾個要旨，對於思想的衍申及時間的流轉較不重視，而此二者則恰是本文所想分析的所在。

註一一：例如汪榮祖的「晚清變法思想析論」，收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一九八〇）。該文從各個角度探討清末的變法思想，公羊義例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同時該文針對思想立論，幾無歷史流變方面的分析。

註一二：例如吳康的「晚清學界之進化思想」，收入前注同書。該文探討康有爲與廖平二人著作中的進化思想，甚爲簡要。至於討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中國影響的，則有郭正昭的「達爾文主義與中國」（收入同書）及張朋園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一九七九）等論文。它們都是本文探索清末公羊思想的重要基礎。

註一三：其中最著者爲許冠三的「康南海的三世進化史觀」，亦收入註一二所引書中。該文對康有爲的三世進化史觀探討得十分詳密，且多精闢之見。不過對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只旁及之，對廖平這一關鍵人物則闕之，因此就清末思想史的內在理